



金瓶梅詞話卷之四十一

金瓶梅詞話卷之四十一

#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

分裂体制下韩国的视角

(韩)白乐晴 著

金正浩 译  
郑仁甲

中国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韩)白乐晴 著.-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12

ISBN 7-5071-0484-2

I.全…II.白…III.①民族文学-文学评论-韩国-现代②世界文学-文学评论-韩国-现代 IV. I 31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5407 号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兵器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9.5 字数:43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含精装本 500 册)

\* \* \*

ISBN 7-5071-0484-2

定价:精装:35.00 元 平装:30.00 元

## 前 言

首先，很高兴我的文章翻译成汉语，与中国读者见面，但这次和以往在韩国或在其他国家发表文章的时候有所不同，心里不免有点紧张。

本书中的文章本来是以韩国读者为对象而写的。除此之外，我成长于中韩交往被中断的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故对中国难免有隔膜之感。而且我从小就在西方留学，后身为英美文学教授，所以深知自己非常欠缺东方人共有的教养。正因如此，我对这些难称完美的文章能否为广大中国读者所接受不无忧虑。

但这些文章所赖以产生的韩国现实，对中国人来说，或许并非毫不相干，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与中国的断绝状况，不就是由于诸如清日战争、中日战争、韩国战争等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而引起的吗？当然，随着韩中两国各方面交流的增加，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在世界上日渐重要，韩国人对中国的隔膜理所当然地逐渐化解了。在这个时候，双方如何认识对方，如何增进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已成为两国人民正面临的一个课题。从历史上看，中国未能像韩国重视中国那样重视韩国。尽管这其中有着国大事务繁的原因，但终究是一个遗憾。今天，中国的视界除了美国和日本以外已拓展到整个世界，因此，如何看待一衣带水的仍然保

有独特的生活和文化基础的韩半岛，对欲建设新型国家的中国人来说，可能具有一定的意义。

本书中的文章，虽然存在着对中国了解不多的缺点，但它们都是为正确认识世界中的韩国、尤其是被分裂的南北韩一方的韩国，进而克服其中存在的矛盾而写的。所谓“民族文学”的概念在本书中占有核心地位，因为它不是指在殖民国家的“国民文学”，还包含着断然拒绝只成为被分裂的其中一方的“国民文学”的意志。还有，这样的拒绝姿态，至少在我们经过的民族危机中，我们坚信这就是确保韩国文学的“文学价值”和“世界文学的普遍性”必不可分的因素。

在这一点上，与主要指出“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相差很大。我认为，对在外来势力和压抑体制下的民族抵抗与创造真正的文学关系重大，在这一点上，中国读者比日本读者或美国读者更容易跟我们认同。但据我所知，如今的中国——近来韩国也差不多——因经历了长时间政治过热时期，而对把民族抵抗和一切政治问题与文学联系在一起，有着不少反感。而且对全球化的“民族文学”乃至“国民文学”的存在价值和存在方式，仍还需要更多的讨论。因此，只要本书中的文章能够表达出我个人对左右双方政治过热方面的“文学式抵抗”的想法，就很满意了。通过这些，如果中国读者朋友们能够理解我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人类爱的看法，我将会感到无比的高兴。

目前，韩国正面临着从去年底开始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正经受着世界化带来的考验。在敞开物质大门之际，如何不排斥不失去精神，而如何进一步把这种考验当做克服南北分裂体制的契机，与此同时，既适应眼下的全球化，又为

世界体系的本质性改革作出贡献，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任务。要完成此任务，需要许多中国有识之士的帮助，这完全不是客套话；这个任务与中国人民的未来有紧密关系，这也不是虚张声势。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完成此任务助一臂之力，同时也借此机会来弥补自身对中国认识的不足。

最后，我向在翻译过程中，统筹兼顾的金正浩先生，欣然参与艰难翻译工作的郑仁甲教授，予以宝贵序文的严家炎、乐黛云教授，在韩国为此事操劳的白永瑞教授和李旭渊教授，表示诚恳的感谢。

著 者

1998 年 9 月



## 序 言

严家炎

我怀着巨大的兴趣，拜读了韩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白乐晴先生论文选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的中译稿。

阅读朝鲜半岛现代作家、学者的书，在我，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源于历史，源于近百年来中韩两国相似的命运。记得十二三岁时起，我就从《牧羊哀话》《没有祖国的孩子》《露西亚之恋》一类小说中感觉到了韩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和顽强抗争，后来更知道了中韩两国志士间相互同情、携手奋斗的许多事迹（这类事迹据说最早可追溯到1921年在长沙由毛泽东等人发起成立的“韩中互助社”）。这使我一直对近代以来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比较关心。

然而，此次读白乐晴教授的著作，我作为一个中国同行，却不仅感到了亲近，更因全书内容的扎实、丰富和见解的令人倾心，进一步感到了由衷的惊喜与钦佩。

早在二十多年以前，白乐晴先生就以倡导“民族文学”著称于时。但诚如他自己所说，他提出的“民族文学”，并不能误解为通常所称的“民族主义文学”。他倡导的“民族文学”，“扎根于对于民族危机的认识之中”，代表着全民族“多数民众的实质性要求”（《民族文学的现阶段》），实际

含义是反帝爱国，内则推动社会民主与民族统一，外则与第三世界相衔接的民众文学，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以其自身的独创性为全球作贡献的文学。他曾坦诚地说过：“民族文学论从一开始便包含了民众的意向”（《民众、民族文学的新阶段》）。这从他肯定朴景利的长篇小说《土地》时着重强调“作品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对民众生活有深厚的体验”也能感受出来。这种文学既要有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泾渭分明，又要摆脱僵死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从较早的《市民文学论》到后来的《统一时代的韩国文学》，许多论文中贯穿的，正是这种民族、民众的立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白先生何以会在六七十年代被多次拘捕，也能够理解何以他的主张会在国内产生较大的影响。可以说，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时刻关切着全民族、全社会的利益，乃是这本论文集的第一个显著特色。也因此，白乐晴先生赢得了中国同行们的尊敬。

贯穿这本论文集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我以为是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开放的文化胸襟。白乐晴先生不仅时时关注韩国文学的发展，还经常把本民族文学的问题放到世界文学潮流这个大背景上来考察和衡量。这也许与他自身从事西方文学研究的专业岗位有关系。在学术见解上，白教授显示了“有容乃大”的气度。他充分肯定世界范围内写实主义文学的功绩与成就，但并不绝然排斥现代主义，似乎也不赞成无限扩大写实主义的概念来容纳有价值的现代主义作品。相反，在《如何看待现代文学》一文中，他批评了卢卡奇“对卡夫卡或普鲁斯特持否定的态度，就连布莱希特那样的作家也仅仅是主要地肯定其形式上的创造性而已”；并且认为，对待现

实主义，“一边如实地意识他们的作品所具有的‘颓废性’，一边又如实地评价和吸收他们的成果，这才是现代文学中最困难的工作。”白教授对卡夫卡、布莱希特等现代主义作家作品以及人们争议颇多的劳伦斯的小说给予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在中国大陆，实际上要到“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初才纠正独尊写实主义的思潮，重新引进并客观地评价某些现代主义作品；而白乐晴教授却早在七十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由于对当代西方文学比较透辟的了解，白教授往往把我们某些学者说了一大堆仍令人莫名其妙的“后现代主义文学”问题，只用几句话便点得清清楚楚。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白先生在论文中与弗雷德里希·詹姆森教授就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分期与归属问题进行的那场讨论。现代主义是否已像写实主义那样被资本主义所吸收？后现代主义是否已从本世纪四十年代起成为一个独立的时代？白教授在《现代主义续论》中提出的那些见解，也正是中国同行们乐于听取的。我自己就从白教授这部论著中获益良多。

贯穿在白教授这部论著中的第三个明显特色，我以为是审美的眼光。文学毕竟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必须坚持以审美标准衡量才能获得恰当的评价。本书作者无论是评论韩国国内的作品，还是评论哈代、劳伦斯、卡夫卡等西方作家的作品，都注意从作品艺术成就的实际出发，透过艺术内容来评价思想意义。坚守这条原则，就能保证作者在重视文学作品的社会使命的同时，防止落入庸俗社会学的陷阱。关于这方面，中国文学界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经验教训实在太多。

当然，在某些具体学术问题上，我和白教授的意见可能不尽相同。以现代主义而言，在我看来，这种文学在其诞生之初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打着深刻的“颓废”烙印。但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形成之后，则未必永远和“颓废”相联系，聂鲁达就是例证。即使写实主义文学，当初在深刻批判现实的同时，也曾呈现出悲观的倾向。我赞成将写实主义看作极重要的乃至最基本的创作方法之一，但我认为，方法本身不是万能的，它对文学作品的实际成就并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真正决定作品实际成就的，是作家是否具有真切深刻的人生体验、厚实丰富的文化修养和独特过人的艺术才华。但这类问题，一时自然说不清楚，需要另行讨论（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对白教授意见是否存在误解的地方）。

不管怎样说，白乐晴教授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相信，在今后中韩文学和文化交流史上，将会记上一笔。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于北京大学

#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汉译本序

乐黛云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与韩国的学术交往相当频繁，但多半是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讨论和交流；应该承认，关于韩国当下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发展现状，我们的确知之甚少。这次，有幸拜读白乐晴先生的评论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汉译本，真是感到中韩两国不仅在历史上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即使在现代也有许多共同面临的问题和类似的考量。

白乐晴先生生于1938年，多次赴美留学，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后，多年执教于汉城大学。早在1966年，韩国最著名的思想文化杂志之一《创作与批评》创刊时，他就担任了该刊的创刊编辑人，并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很多引起重视的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汉译本所选录的就是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我认为在这些文章中，白乐晴先生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一些重要的根本问题。

首先，白乐晴先生对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十分重视厘清民族文学与一切国粹主义和复

古主义文学的界限，一再说明民众文学决不等同于民族主义文学。他明确指出：民族文学与“将民族规定为某种永久不变的实体，或至高无上的价值并以此作为出发点的国粹主义文学论，以至文化论不同”（《为了确立民族文学的概念》），它既不是“只将民族传统的一部分随便阉割下来保存与展示”，也不是只“鼓吹国民生活现在与将来的暧昧乐观”（《民族文学的现阶段》）；他认为民族文学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实际生活中，以‘民族’为单位而结为一体的人群”，“为其真正美好的人生”而创作的文学，这种文学特别是要直面“对民族生存的尊严所进行的现实性挑战”，关注民族发展所面临的矛盾和痛苦。

白乐晴先生进一步指出，这种强调民族现实特殊性的文学，不但不会从世界文学的行列中脱离出去，恰恰相反，它将承担起现阶段世界文学中最先进的第三世界民族文学的一翼，而以自己的特色使世界文学得到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因为，在后殖民时期，彻底揭露和批判旧殖民制度在人类精神上造成的悲剧和残害正是当代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将和发达世界作家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畸形社会的批判一起汇成滔滔洪流，而“彻底批判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民族文学的一个基本的、赖以生存的基础”，它提供了一个“先进国的文学无论如何也是达不到的境界”，（《为了确立民族文学的概念》），这就使第三世界民族文学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占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白乐晴先生举例说，卡夫卡的《城堡》或《审判》之类的作品站在小市民的观点，将帝国主义时代西欧社会令人窒息的气氛反映得十分生动。在资

本主义发展初期，自由资产阶级曾是创造历史的主角，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由资产主义的一部分和广大工人一起沦落为机器的附庸而失去了生活的自由。卡夫卡等许多西方作家相当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但如白乐晴先生所说，他们很少想到“从历史的因果关系中去理解这种非人的状态或努力用与同胞们的连带意识去克服它”。从这一点来说，与绝大多数民众共呼吸并身受殖民主义压迫的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学在反对帝国主义，揭露殖民主义方面确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

最为可贵的是白乐晴先生并不只是停留于这样的一般论述，他明确指出：“当然，仅仅以批判帝国主义便可跻身于世界文学先进行列的逻辑并不成立”；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同自己本身的斗争，是在自己民族内部识别出迎合殖民统治的势力并加以批判，进而“在自身心灵深处，能够区分和战胜封建精神和买办意识”。既然“产业社会的困境是指由于人类的创造性劳动而产生的工业技术性理性从人生的本来要求中分离出去，反而夺走人类的创造性”，那么，重视从内在方面批判殖民统治、买办意识的第三世界民族文学就有可能将“这一西欧文学的最先进的主题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从另一方面对世界文学作出自己特殊的贡献。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以研究英美文学为专业的白乐晴先生对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有相当明智的看法。他清醒地提出：“后进国应培养自己的能力，以便主体地适应以西欧为中心的先进产业社会的世界性支配，在这种适应过程的深

层，隐藏着后进国容易自告奋勇地被编入先进国的一般性统治体制之中的危险”（《如何看待现代文学》）。我认为强调这一点十分重要。特别是目前，由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普泛化形成的强劲的全球化趋势正在无可阻挡地消解着各民族文化原有的特点，如果不从主观上警惕白乐晴先生提出的“被编入先进国的一般性统治体制之中的危险”，文化的多元化也就会成为一纸空言。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必然有赖于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正如白乐晴先生所说，如果只有吸收和模仿，就不会有真正的创新。他举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智利诗人聂鲁达为例，指出聂鲁达虽然也采用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他的超现实主义不像西欧理性主义那样带来“内在化”和“非大众化”，反而使他的诗同与西欧理性主义相距遥远的拉丁美洲民众接近起来，并以他们的意识去生动地描绘外在世界。这使他的文学深深扎根于智利的现实和土著传统，同时又是用西欧语言写成的 20 世纪文学的顶峰之一。

因此，白乐晴先生认为民族文学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该民族大多数成员的民众，他屡次强调民族文学就是民众文学的同义词。但是，据我了解，白乐晴先生所讲的民众文学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阶级差别是很难避免的，“既然资本主义经济是占有和支配资本的一部分人雇佣那些没有资本只有剩余劳动力的人……那么，很显然，这两种人之间产生理解关系上的差别，产生矛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他同时强调，这些差别和矛盾并非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无数诸阶级与阶层之间变化着的离合聚散”，根据这一看法，白乐晴先生认为：“民众文学不

是哪一阶级或两三个阶级的文学，而正是具有多种阶级的和阶层结构的广泛联合势力的文学”（《民众、民族文学的新阶段》）。如果这样来定义民众文学，那么，任何社会精英都不应自外于这样的民众文学。他尖锐地指出：“在民族尊严与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以艺术的名义逃离其危机，或为单纯地关心增长知识而行动，是背叛民族的行为，也正是背叛文学的行为”（同上），这就杜绝了所谓精英文学逃离民众文学（即中国所说的大众文学）的任何借口。

此外，在这本书中，白乐晴先生还以他深厚的学识积累和丰富的艺术阅历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当下的热门话题都作了独到的、很能发人深思的剖析；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白乐晴先生的每一理论断言几乎都有丰富的作品分析作为根据，都是从作品中提炼出来的理论结晶。读完这部著作，对于韩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也就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界多少存在的文学理论脱离作品实践的现象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借鉴。

1998年11月15日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